

突厥灭亡 原因浅析

赵 醒

突厥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六世纪时，游牧于金山一带。西魏时期先后败铁勒、破柔然，建政权于今鄂尔浑河流域。其疆域最广时，东至辽海，西达西海(今里海，一说咸海)，南到阿姆河南，北过贝加尔湖。有文字、官制、刑法、税法等。北朝统治者与之通婚，人民互相往来，经济文化交流频繁。隋开皇二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

大业七年，西突厥可汗入朝隋炀帝不归，国人另立新汗。唐武德年间，西突厥北并疏勒，西拒波斯，势力强大，对唐朝西域构成威胁，并于贞观初年与高昌等政权结盟反唐。太宗遂派军出征，先后攻克高昌城，平定焉耆王、龟兹王之乱。此时西突厥发生分裂：“北庭”居犂鞞山西北，控骏马，结骨诸国；“南庭”居虽合水北，辖伊列、龟兹、吐火罗等国。唐显庆二年，高宗派军西征，大破西突厥，其地其民尽归唐朝。至德至大历年间，西突厥各部遗民融于回鹘等部，其族消亡。

开皇三年，东突厥与隋朝修好，并于次年归附。隋亡后，可汗迎立炀帝孙为隋王，并于武德年间至贞观初年多次与地方割据势力联合犯唐。贞观三年，太宗派军出击东突厥，俘获可汗，后其继任者降唐，东突厥国灭。贞观至永隆年间，东突厥降众重新自立可汗，未能长久。永淳元年，阿史那骨咄禄自立反唐失败后，召集散亡称汗，称“后突厥”。自永淳元年至天宝三年，后突厥内部乱不止，天宝三年，回纥乘乱灭之。

东、西突厥虽长期分裂，且灭亡时间略有先后，但二者灭亡历程相近，故可将其视为一体，以下为对其灭亡原因的简单分析。

在汗国内部，突厥社会封建化不充分，导致部落之间纷争频繁，牧民与贵族之间矛盾一触即发。

隋唐时期，突厥处于由奴隶制氏族公社向封建社会过渡之际，而汉族社会的封建化已高度发展，在彼此交往中，突厥自然地受到汉族社会各方面的吸引和影响。“（大业）三年春，时突厥启民可汗入朝，……请袭冠带，帝不许。明日，又帅其属上表固请。”“夏，……愿帅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此处，“冠带”和“衣服”指隋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制度，启民可汗的再三上表体现了突厥对于中原先进的封建文化的向往。后来，突厥在迎立炀帝孙后引入隋代官制，并任用汉人赵德言。“德言专其威福，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国人始不悦。”由此可见，突厥社会上层建筑的封建化未能促进其社会发展，甚至从未实现过真正的中央集权。在汗位的传承上，突厥社会也未形成固定的传承制度，部落内部与部落之间因汗位继承常兵戎相见。太建十三年十二月，“突厥佗钵可汗病且卒，……国人将立大逻便（佗钵兄之子），以其母贱，众不服，……竟立庵逻（佗钵之子）为嗣。……庵逻以国让摄图，号沙钵略可汗（佗钵兄之子）”。至德元年五月，“沙钵略……袭击北牙……杀阿波之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达头（西突厥可汗）。”这种由上层建筑封建化不充分导致的部落纷争，使貌似强大的突厥实际上处于内乱与分裂的长期隐患中，它的强大是经不起外力挤压的。

同时，突厥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充分汉化，这使其国家运行和国力维持总处于不稳定中。隋朝时期，突厥社会虽然已经出现了某些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但奴隶制仍有残余。上层统治者作为奴隶主，为俘获奴隶和掠夺财物不断侵扰汉族政权领地。武德三年至武德九年，见于《资治通鉴》的突厥进犯有58次之多，尤其是后三年，唐朝边境无一

季不遭受突厥袭击。每次袭击，都会有大批唐人被掳走作奴隶，被迫投入突厥固有的落后单一的游牧式生产方式中。游牧式生产方式几乎完全依赖自然气候，一旦遭遇天灾，社会便陷入困境。贞观元年，因大雪和连年饥谨，突厥“杂畜多死，……民皆冻馁。颉利度不给，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浸弱。”这场天灾给突厥经济军事带来沉重打击使其政权不稳，内乱一触即发。至贞观三年，连年霜旱使突厥饥荒严重，牧民与奴隶一同向贵族展开猛烈的反抗，太宗于这一年派兵出击，将之轻松击垮。

在汗国之外，突厥同其他部族间军事行政上的联合因缺乏经济文化交流作为基础，是不稳定且易于瓦解的。

表面看来，东、西突厥掌握着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和弱小部族，十分强大，但这种强大本身也恰是其弱点。突厥与其他势力的联合以武力征服为基础，多出短暂的共同利益或弱者向强者的妥协，既未形成共同的语言文字也没有建立共同的经济基础。因此，突厥仅是一个领域广大却政权松散的军事行政联合体，与各部族日益增多的矛盾和与地方势力间短暂共同利益的消失，使得这个联合体随时可能被瓦解。“贞观元年，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皆叛（突厥）。……明年，……岁大饥，衰敝苛重，诸部愈二。又明年，属部薛延陀自称可汗，以使来。拔野古仆骨同罗诸部、奚渠长皆来朝（唐）”。“贞观三年八月，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统特勤入贡，上（太宗）赐以宝刀及宝鞭”，东突厥“大惧，始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婿礼”，与薛延陀部的联合随之瓦解，这对唐军最终讨灭东突厥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是大势所趋，唐王朝经过多年积累，在各方

试论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李 杨

21 世纪是一个知识化、信息化、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知识经济的内动力在于各种创造和革新活动。江泽民同志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能力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国际竞争和世界总格局中的地位。所以以开发和激励学生创造潜力的创新教育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浪潮，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因而，如何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如何开发人的创造力，不仅成为各国政府和科学家、教育家共同关心的课题，而且也成为我们迎接信息社会、挑战知识经济的迫切而现实的选择。

所谓创新人才即是有思想、有个性、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运用所获得的知识去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知识，能够开拓新的领域、建立新的社会生活的人才。他们身上具有以下特征：

1. 独创性。独创性的具体表现是，敢于在思维的空白地段垦荒，对于未知领域和迷惑不解的现象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善于发现现实中的新问题、新情况，能够发前人之未所发，见前人之未所见，特别是对于老生常谈、司空见惯的老问题能提出新的看法，或能从新的角度提出新的见解，赋予新的内涵，有已知引出未知。

2. 多向性。能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

题。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发散式思维，在面对一个问题提出多种设想和答案，以扩大选择余地；二是换元思维，事物的质和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就是事物的多元性，如果换一个因素，就是换元，就可以产生新的思路；三是转向思维，即思维在一个方向受阻时，便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往往能够获得成功；四是创优思维，即在已有答案的情况下，从新的角度寻找更新、更优的方案。

3. 跨越性。就是以角度的思维跨度，较快的思维速度求得较高的思维功效。它的实质是思维的自由驰骋，具有较大的想象空间，善于多方面的联想和及时转化，能够汲取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新经验、新方法为自己服务。

4. 综合性。所谓创新，是在很大程度上综合利用前人或他人的思维成果。具体表现在：一是善于汲取他人知识宝库中的精华，通过巧妙结合，形成新的成果；二是把大量的概念、事实和观察材料综合在一起，加以概括整理，形成新的内涵更丰富，应用更广泛的思维成果；三是利用辩证分析的方法，吸取成功的经验，探究失败的教训，从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创新性人才的四个特征表明，创新性思维对社会的发展，对人的活动有着

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教育领域的情况却不容乐观，许多方面存在着问题。

一是教育观念落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些部门和有关人员仍习惯于用过时的标准来衡量受教育者，过多地强调规范化、模式化，不注意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能力，培养出来的学生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

二是教育体制封闭。政府对教育事业的管理不够开放，使教育系统内部缺乏应有的活力，缺乏自生机制。在学校内部，管理不够科学，不注意吸收社会发展的新观念，教师为教而教，学生为学而学，使教育活动陷入了“读书——考试——文凭”这样一个僵化的模式。

三是教学手段落后。不少教师的头脑中仍然固守着“仓库理论”，把学生当成一个储藏知识的“仓库”，满足于死板的教学方法，进行“填鸭式”和“满堂灌”教学。实际上我们不少课程的内容早已过时。美国哈佛大学的管理学教材每年要淘汰 20%，世界上最权威的生物学教材每五年要全写一次。这些都是我们赶不上的。更严重的是，许多地方的教育事业不要说采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就连起码的教育经费也被挪用，教师工资拖欠，教学设备不全，有的仅靠原始的设施勉强维持。

面都为讨灭突厥做好了准备。

自两晋末年到隋统一全国，随着国家分裂、民族冲突、阶级矛盾等问题的解决，统一和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隋初颁行的三省行政中枢制度、试策取士制度缓和了士族和庶族间的矛盾，施行的均田新令、租庸调法、三长制度和户口调查登记工作缓解了阶级矛盾，增加了税收，但炀帝登基后的内外失治使国家再次陷于分裂。唐初统治者亲历了隋的兴衰，深有体会，故在统治初期先韬光养晦，实行了更为宽松的均田租庸调法来缓和阶级矛盾，修复社会经济。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社会经济完全恢复。在政治上，唐朝沿用三省行政中枢制度，并采用科举取士制度，缓

和了阶级矛盾。在军事上，太宗先派军讨灭、瓦解突厥各部力量，使其陷于孤立，并派遣卓越的将领李靖等出兵征讨。由于这些优势，唐军很快就歼灭了突厥。

突厥国亡之后，唐朝采用羁縻政策来妥善安置突厥降民：用其部酋为官员治理其民；使其贵族入居内地担任官职；安置其降众在北部边境并设都督府及督护府进行管辖。此后，唐与突厥保持着相对和好的关系，近边的突厥民众逐渐与汉人融合；其他部分的突厥民众则逐渐被回纥同化。至此，突厥的民族也溶化于其他民族之中，真正被灭亡了。

（作者系郑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